

胡思庸学术文集

胡思庸 著



HUSIYONG XUESHU WENJI

胡思庸学术文集

胡思庸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思庸学术文集/胡思庸著.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649-1365-6

I. ①胡… II. ①胡…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

IV. ①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4859 号

责任编辑 胡玲霞

责任校对 李 云

封面设计 翟森森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33 千字 定 价 2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胡思庸先生

前 言

正值胡思庸先生逝世一周年忌辰就要到来之际，获悉他的学术文集已由其及门弟子郑永福、王宏斌、田海林诸同志整理编定，即将付梓。本书的出版，可以告慰胡先生在天之灵。我与胡先生相识四十余载，谊兼师友，对他的了解很深。在本书即将问世的时候，写一篇短文，概述胡先生的生平事迹与道德文章，必将对读者更好地认识胡先生的风范与学术地位有所帮助。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胡思庸先生，笔名田用、吴鸣世，1926年9月17日生，河南省信阳县人。幼年在家乡上小学，后就读于甘肃清水国立第十中学。1946年暑假，考入河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又转入文学院历史系。1951年元月毕业后留校，一方面负责《新史学通讯》的行政事宜，一方面充任稽文甫先生的助手，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与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后历任讲师、教授，并担任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主任。1983年，出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仍兼任河南大学历史系的工作。在此前后，又担任中国史学第二、三届理事，河南省史学会会长，郑州大学名誉教授，河南省社联副主席，《中州学刊》主编等职。积劳成疾，不幸于1993年8月26日在郑州逝世，享年67岁。

胡先生的一生，是由一个好学深思、具有民主爱国思想的青年学子，逐步成长为一位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并在学术上取得卓越成

就的学者的一生。

胡先生自幼颖悟过人，早在中学时期，就醉心于文学与哲学。他喜读宋词，继而阅读《人间词话》，研究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为了追本溯源，又进而研究西方叔本华（1788—1860）、尼采（1844—1900）的哲学著作。大学时期，更泛滥于文、史、哲诸领域，为日后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解放以后，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就。

胡先生研究的重点，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由于他的根柢深厚，尤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的造诣很高，故而在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能取得开创性的成果。他的研究，首先从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的思想入手，旁及龚自珍、魏源，下延康有为、梁启超，上溯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理清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脉络；继而由常州学派的兴起，论述鸦片战争前经学的演变及汉学与宋学之争，透辟分析了中国古代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变的轨迹；再继而研究洋务派、太平天国思想及晚清格致之学，最终构筑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整体框架。这些卓越成就，使胡先生不愧为中国近代思想史这门学科的开拓者之一。

解放以前，胡先生就富有爱国民主思想。解放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学习，他更从一位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位社会主义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战士。他为人诚挚、热情，对工作一丝不苟。他热心培养后进，无论是对研究生、本科生，都谆谆善诱，悉心指导。他学术造诣深厚，治史严谨缜密，态度谦虚谨慎，向不肯轻于下笔著书。他文不虚发，所论每有创见，且富于文采，有很强的可读性。胡先生不仅肩负着繁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还在担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为河南省的学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胡先生不幸过早谢世，实在是学术界一大损失。所可幸者，他

的高足在学术上已多有建树，无愧师门。薪尽火传，后继有人，胡先生应无遗憾。更可贵者，他们在胡先生仙逝后，即积极筹划出版胡先生的学术文集，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精心编就，可谓尊师重道，恪尽弟子之职。有这样好的门人，胡先生当可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魏千志

1994年8月25日

于汴京寓舍

目 录

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	(1)
鸦片战争前夕的“汉宋之争”·····	(38)
龚自珍思想论略·····	(47)
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	(69)
论林则徐的思想·····	(92)
林文忠公家书考伪·····	(107)
林则徐手札十则辑注补证·····	(121)
魏源思想论略·····	(129)
何玉成冤词	
——三元里抗英斗争领导问题之我见 ·····	(145)
《川鼻草约》考略·····	(158)
近代开封人民的苦难史篇	
——介绍《汴梁水灾纪略》 ·····	(168)
鸦片战争史研究述评·····	(175)
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	(182)
太平天国与佛教·····	(212)
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问题·····	(230)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的苗教大起义·····	(263)
汪士铎思想剖析·····	(289)

关于康有为“通三统”、“张三世”的浅释

——答西安余培英、长沙史政同志问	(315)
义和团运动时期河南人民的反帝斗争	(322)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的格致学	(342)
古代经学的发展与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	(361)
五十年前的白朗起义	(377)
“五四”的反传统与当代的文化热	(396)
《河南历代名人辞典》序	(406)
《晚清货币比价研究》序	(409)
附录：胡思庸著述目录	(412)
后 记	(415)

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

一 前 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有数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灌溉着辽阔的祖国大地，创造了先进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绵长的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科学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自从17世纪西欧各国相继跨入资本主义社会起，它们的社会经济与科学文化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而中国虽然至少在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为时并非太晚；但是，这一萌芽的生长倍加困难，中国仍然在封建的途程上蹒跚而行，开始落后了。18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西方国家的大步前进，中国更加明显地落后了。

为什么先进的中国变成了落后的中国？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多少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找寻答案。例如说：中国文化是静的，西方文化是动的。但事实上，矛盾运动是事物存在的普遍形式，中国的社会历史同西方一样充满了斗争和动荡。还有人说：中国好比一个农夫(farmer)，一锄头一锄头种

地，自然要慢，西方好比水手(sailor)，远航千里，自然要快。^①但中国人不但长于种地，也长于航海和通商。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是中国人最先运用到航海上的。一直到15世纪，中国的造船技术还比西方先进。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横贯亚非航道，比达·加马绕道非洲通向印度要早几十年。所以上述那种肤浅的比喻实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此外，还有什么西洋人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国人是“理智运用直觉的”^②等等说法，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昏话，这里没有必要加以辨明了。

总之，一切唯心主义的或简单直观的方法，丝毫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阶级分析入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分析入手，才能够找到合理的答案。

毛主席在论述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时曾多次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如果单就国内来看，也就是说，中国的封建势力是异常强大的。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形成了一套强大而坚韧的体系。想打破它，就比较艰难。它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郭沫若同志曾打了一个比方：比如竞走，别人身上的负担轻些，包袱小些，我们身上却背了很大的包袱，如牛负重，怎能不迟到几步？所谓包袱，就是旧的传统势力。这个比喻是深刻的。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相对地说，都比中国容易，因为它们的封建包袱比较轻。犹如现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老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倒是比较慢，而在落后的俄国和中国，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却首先突破。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包袱比我们重，是一样的道理。经济发展固然一定

① 罗梦册：《中国论》。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要替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恩格斯说:当国家权力沿着经济发展的相反方向起作用的时候,“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①。

本文试图在这一原理的指导下,粗浅地探讨一下清朝政府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以致形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这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探讨,也许是一个不无裨益的侧面。

二 闭关政策的社会历史根源

闭关政策不同于通常的严格管制对外贸易的政策,而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这种政策不限于外贸的和外交的领域,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带有与世隔绝和盲目排外的倾向。闭关政策形成的原因,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但其中有一些问题,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这里想着重从上层建筑的角度谈一点意见。

(一) 它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

如前所述,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而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却是立足于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个体经济之上的。毛主席曾经指出:“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②封建的国家权力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防止商品经济的瓦解作用,历代王朝无不厉行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特征就是依靠地主阶级,打击市民阶级,保护小农经济。

① 《致康拉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7页。

② 《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885页。

这种情况同西欧的封建社会恰成鲜明的对比。在西欧，王权曾经是进步的因素。国王在集中王权、打击封建领主分裂割据的斗争中，和新兴的市民阶级结成联盟。恩格斯说：“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①国王不但需要市民政治上的支持，而且在经济上，市民所纳的捐税是国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接着“地理大发现”的热潮以后，西欧各国政府便相继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极力提倡对外贸易，把对外贸易视为国家财富的源泉。这种政策大大加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而中国的“皇权”却牢守重农抑商的信条，对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一贯地限制、摧残，至于海外贸易，更使他们觉得无足轻重。虽然在某些时候，少数封建帝王为了“宣扬国威”和解决财政困难而有限度地提倡一下对外贸易，但是要知道，中国封建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田赋和徭役，对外贸易只能占很次要的地位。^②《明史·食货志》记载：

永乐初，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帝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听。^③

明成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曾经派遣郑和七下“西洋”，但他压抑本国“逐末”的工商业者，不在乎对外贸易的财政收入。

① 《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3页。

② 宋高宗为了补救财政匮乏，曾下诏奖励海外贸易，但他自己承认：“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据统计，那时的市舶司岁入也不过占国家总收入的1/20。参看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

③ 《明史》卷81，《食货五》；又见《明史》卷326，《外国七》。

他尚且这般见识，后期守成的君臣就更加等而下之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如果放在当时的西欧，就会成为举国若狂的崇拜对象；但明朝统治者对他评价不高，有些人还拼命反对，说：“三保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①连郑和航行的纪录、档卷也要予以毁弃。所以尽管明朝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政府却长时期实行海禁。

清朝统治中国以后，特别注意继承封建主义的那一整套历史正统，其中包括重农抑商政策。康熙曾亲绘“耕织图”，以示其钟爱男耕女织的小农自然经济。雍正一再颁布“劝农诏”，重申古代“重农抑末之意”，把“工商”视为下等之民（雍正二年诏）。有趣的是，在农业中，他又只提倡粮食生产，而把经营林业及副业都看成是“末”。他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事者，帝王之所以承天养人、久安长治之本也。……安可舍本而逐末，弃膏腴之沃壤而变为果木之场，废饔飧之恒产以幸图赢余之利乎？”（雍正五年诏）^②总之，尽量把小农紧紧束缚在土地上，视商品经济几如洪水猛兽般的可怕。雍正的诏书很有启发性，他认为，重农抑商是帝王的“久安长治”之道，我们便有理由认为，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久安长治”之道，长期延续之道。

再从当时清朝政府的财政来源看，也主要依靠农业税（包括田赋及芦课等项），如果再加上封建垄断性的盐课，就占了岁入的绝大部分；而真正的商业税，所占比重很小。鸦片战前，清政府的岁入总额约为4000余万两（白银），而《乾隆大清会典》根据乾隆十八年（1753）奏销册统计，该年全部关税（包括常关及海关）只收入

① 《殊域周咨录》卷8。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3，《田赋三》。

4324005 两^①，占财政岁入总额的 1/10 左右。那时清朝对外是四口通商，该年江苏、福建、浙江、广东四个海关的税收加在一起只有 99.48 万两，还占不到财政岁入总额的 1/40。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封闭了其他三个口岸，仅留广州一口。据《粤海关志》的记录，粤海关的每年税收，长期停留在四五十万两的水平。乾隆末年，清政府为了加强搜括、杜绝官员的中饱，硬性规定粤海关每年必须保证上缴“正税”银 4 万两及“盈余”银 85.55 万两，只许“溢收”，不许短缺；如有短缺，即令广东巡抚及粤海关监督等人摊赔。自此以后，粤海关的税收才有所上升。但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不过 150 万两上下。比起农业税来，仍然微不足道。所以清朝官员认为海关收入“自天朝视之，则无关于毫末”^②。

综观封建政府对内的重农抑商政策，以及它们的财政收入状况，就会理解它们为什么实行闭关政策。因此可以说，闭关政策是重农抑商政策对外的自然延续，其目的同是为着保护封建经济。

政策属于上层建筑，它来源于经济基础。闭关政策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反映。不过，自明朝后期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重农抑商和闭关政策就不再是合理的，而变成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反动政策了。

1793（乾隆五十八）年乾隆皇帝向西方宣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③自给自足，不假外求，这是封建统治者引以自豪的事情，史家们也喜欢用乾隆的话来说明

① 允禔：《乾隆大清会典》卷 16，《户部·关税》。按：清政府关税收入占其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大，并不意味着它对商人的勒索搜刮很轻。相反的，为了“抑商”，清政府的关税是很苛重的。早在康熙年间，就有人指出：“商贾望见关税，如赴汤蹈火之苦。”（《徐清献奏疏》）这好比杀鸡取卵，由于得卵甚少，更加轻视鸡。

②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 3，第 16 页。

③ 《东华续录》乾隆朝，第 118 卷。

鸦片战前中国自然经济的状况。但那话里实在有许多夸诞的成分,实际情况早已有了变化。东洋的铜,南洋的香料犀象之类,西洋的钟表玻璃等物,当时都是中国所缺乏,统治者所追求的东西;至于民间商业文化的交流,就更是历史的必需了。据一个熟悉中国情况的英国人写道:

中国人(指清政府)所常说的,他们不需要对外贸易的话头,好像已经使得英格兰的许多人相信,对外贸易真的对他们就无关重要似的。所有到过中国的人必然人人都知道这种想法何等的错误。广东、福建两省人民之依存于对外贸易,正和英格兰人一样。福建……整个儿依靠贸易为生,从台湾、马尼拉、暹罗和柬埔寨输入大米;用他们自己的船只对婆罗洲、爪哇、新加坡和暹罗经营大量的航运,据中国人告诉我,如今该省去到这些国家的移民每年达二十万人之多。我在海上看到他们的船只,为数极多,沿海也布满了渔船。^①

这个英国人是侵略分子,但我们不以人废言。他从 1817 年起,先后 16 次前来中国,他的所见所闻同历史情况是基本符合的。当时的中国,封建经济成分仍占主要地位,但“自然经济”在不少地区已经开始破坏。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东南沿海人民的生活,都需要“重商”,需要“开放”。而闭关政策同这一需要相反,只是旧的上层建筑惰性力量的表现。

(二) 它来自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封建大国,而几千年来,周围邻国一般都是相对的后进小国。久而久之,封建统治者养成一种虚

① 《安德鲁·韩德森先生致 G. G. H. de 拉本特函》,见《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 2 册)。译文见《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 4 期,第 53 页。按:该函将闽、广对台湾的贸易也算作“对外贸易”,这是侵略分子的谬见,应予纠正。

骄夸诞的习性，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别人都是“夷狄蛮貊”。一直到明朝，对世界还是这样认识。明末，西方耶稣会士利玛窦等来华。从宣传宗教的角度看，当然不是好事，但经他们多多少少带来一点科学知识，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绘制一些“舆地全图”，图上的中国不在世界的中央，引起了许多封建官绅的大哗。官绅们认为，中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县告城）位居天地的中心，古有定论。而“舆地全图”把中国画得“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这真是岂有此理。另外，从图上看来，中国显得不够大，难道中国就这么小吗？（“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所以他们说：这全是“邪说惑众”，“肆谈无忌”。又说：“谈天衍谓中国居天下八分之一，分为九州，而中国为赤县神州。此其诞妄，又甚于衍矣！”^①战国时期驺衍认为：中国只占天下 1/81。中国是赤县神州，中国以外还有一些相当于赤县神州那样的地方，共是 9 州，此 9 州为“裊海”（小海）所环绕；天下共有 9 个像这样的“九州”，外边是“大瀛海”所环绕。驺衍的说法带有很大程度的猜测性质，诚然不足凭信。但他比起后世的顽固士大夫，偏见要少得多，他心目中的世界，比后者也要大得多。两汉以后儒家封建士大夫心目中的世界，除中国而外，天下所剩的地方，简直不多了，而且几乎都是“夷狄”之区。可见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统治者的头脑越来越僵化，心胸也越来越偏狭了。

世界是广大的，中国不在世界的中央——这样简单的地理常识，到了清朝中叶以后，封建者仍然不接受，乾隆年间修的《皇朝文献通考》对世界的描述是：“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②足不

① 魏浚：《利说荒唐惑世》，《圣朝破邪集》（扬州古旧书店抄本）卷 3，第 37—39 页。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 293，《四裔考一》。